



Mediating  
between  
Two Worlds

Oral History of German Female Sinologists

两个世界的媒介  
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

臧健 访谈、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臧健整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301-08847-0

I. ①两… II. ①臧… III. ①女性-汉学家-访问记-德国  
IV. ①K835.1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0975号

书 名: 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  
著作责任者: 臧健 访谈、整理  
责任编辑: 陈 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8847-0/K·07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mailto: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开本 18.5印张 312千字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和中国分不开的时光：我人生中的二十五年

China—25 Years of My Life

苏诺娜(Nora Sausmikat)\*

我第一次去亚洲是1984年,那时刚结束了高中学习,一个人去印度,开始只想去旅游,去登喜马拉雅山,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生活的目的、前途,什么都没有考虑过。但是在尼泊尔,我看过很多很穷的地方和很残酷的一些情况,之后参加了一个发展组织的工作,搞开发,教贫穷的妇女学英语,教孩子们卫生常识,也参加一些管理的工作。那时候我刚刚十九岁,非常理想化,我想我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对那里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影响很大,因为她们想让我留下来,给我一个房子,让我可以长时间住,例如两年或者三年。但我想我必须上大学,我的父母肯定也不同意我在那边留下来。矛盾了很长时间,我最后还是决定回国。那一次我在印度、尼泊尔前后一共待了一年。

刚回德国的时候,我想学习梵文、印度文化,但是当时很多人对我说,学这个肯定没有前途,不能挣钱,你找不到工作,应该选择别的专业。既然不能学印度语,我就想转学汉语,看看怎么样。我还有一个兴趣是戏剧,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我住的地方有个小剧场,上学之外,我也去演戏。从尼泊尔回国以后,我也很想学习戏剧,当导演。1985年,我上了柏林自由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开始学习汉语和戏剧。当时我父亲很反对我的选择,他自己是医生,很希望我也开始学习医学,但是我不顾父亲的反对,还是决心学习汉语。

80年代中期,学汉语的学生还不太多,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比较年轻的,和学生们互相交流都很容易。最初只学习语言,我觉得无聊,没有什么意思。那个时候我在柏林也演过戏,对戏曲有很大的兴趣。我的主课是汉学,还有两

\* 苏诺娜,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德国亚洲基金会董事。

门辅课，一个是人类学，一个是戏剧理论。第一年在汉学专业我们没有别的课，只上语言课。学习一年以后，我想我先要去看一看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我没去过，还不了解中国，可学习汉语那么辛苦，我不知道以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不会有兴趣。所以1985年年底，我决定先去一趟看看吧。我年轻的时候性格很开放，胆子很大，原来我想一个人去，因为我去印度、尼泊尔就是一个人；我的男朋友也很有兴趣和我一起去。为了能去中国，我就到工厂去打工挣钱，因为我的父亲不给我钱，他不赞成我的决定，而是希望我留在德国集中学习，但我还是要去。

1985年10月，我们先到了香港，结果发现虽然我已经学习了一年汉语，可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的话。那时我们还不了解，香港人一般说广东话，很多人不会说普通话。后来我们去了桂林、四川，那时我说汉语很慢，但是他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我们没办法和中国人交流。旅游的时候，有时早上6点钟我们上公共汽车，9点钟第一次停车吃早点，在街上看一些人，我想问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或者是害怕回答，或者是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也看到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一些村民聚在一起折磨一条狗的情况，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时我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他们心理很压抑。后来去西藏，在西藏的印象变得好一点，因为感觉他们很随和，不像其他地方的人感觉那么压抑，他们在街上唱歌、跳舞，很欢迎我们。80年代外国人和中国人联系没有那么多，中国人非常害怕接触外国人，现在，你们可能想象不出来那种压抑的气氛。

后来我们去上海、北京，开始慢慢和中国人聊天。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练太极拳，所以每天早上很早起床，去北京的公园打太极拳。我们那时如果想和中国人交流，就和他们一块儿打太极拳。有一次一位妇女问我：“你是外国人，你有没有兴趣来看看我在上海的家？你们可以在我的家里住，我带你们看一些好看的地方。”这是第一次一个中国人邀请我，我说：“好。”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去。可是一到上海我们就累死了，因为没有一分钟我是一个人。一到那里，有很大的家庭、很多人，他们热情地说“欢迎欢迎”、“吃饭吃饭”，做这个做那个，看这个买那个，从早上到晚上，我们身边一直很热闹。他们把自己的床给我们睡，他们住在客厅。三天当中，除了睡觉，没有我和男朋友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不习惯。另外他们说的话，因为是上海话，我大部分听不懂。但这是我第一次和中国人真正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习惯怎么样，所以我很高兴，也记得很清楚。

回国以后,我还不清楚是继续学习汉语还是做什么。我比较集中学习戏剧、人类学,也开始学习政治学,汉语只是其中一科。后来我想如果要继续学习汉语,我只能在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回来以后,我感觉,这是太远的一个国家,太陌生的一个社会和文化,我不想一直在柏林学习汉语,那样离得太远,我要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边学习。所以从1987年开始,我准备再去中国。我申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奖学金,他们问我希望去哪儿,我说第一是北京,第二是南京,第三是成都。后来我收到成都的邀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成都,可能是从成都到西藏比较近,也可以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当时要在那儿学习,我们都必须有一个研究课题,我选择了一个文学方面的题目,关于西藏的叙事诗《格萨尔王》,我想知道这个原始的叙事诗对在四川的少数民族文学或四川当地文学有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到成都很合适。

1988年8月份我来到成都。我们住的地方开始对我来说也不习惯,因为是非常小的房间,那里有两张床,两个桌子,还有一个很小的书柜,房间大约只有十平方米。六个人要共同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客厅,还是跟在上海住的家庭一样的感觉,没有地方可以让你一个人关上门,没有一个私人的空间,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变化。开始的时候,我和一个日本留学生住在一起,也是很习惯,因为她太礼貌了。她进我们自己的屋子,每次敲门要问:“我可以进来吗?”我想这是你自己的房子,怎么不可以进来?这样太不自然了。刚开始到成都,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独处的时间和机会,我很不习惯。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有,中国人总是好奇地要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的?在中国待多久?当然以后慢慢习惯了,我也问他们。那时留学生上课的内容都是宣传性的,觉得很无聊,对语言的进步帮助也不是很大。所以我想,最好是找到一个中国朋友,和她一起交流,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那时学校对留学生的管理是很严的,中国人进来还要登记名字,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离开、要看谁等等,完全没有自由,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很生气,认为这是黑色的管理。后来我找到一份工作,在夜校教中国人学习英语和德语,那时候开始觉得有意思,因为上夜校的人年龄比较大了,他们很想了解国外的情况,我们一起聊天,谈到政治、社会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他们请我到他们的家里去,给我做饭,一起听音乐,这样就慢慢变得比较放松、比较舒服一点。

第二年,我希望能到北京去学习,我已经准备好了,波恩的DAAD也已经同意了,但是后来没有成功。那时学术讨论很开放,我们争论一些美学、哲学、女权



苏诺娜 1990 年川剧演出的剧照

主义等问题,也谈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历史观,中美关系,萨特(Satre)的存在主义。那时有一位从美国来的访问学者,他讲授韦伯的理论等等,上课的教室中挤满了来听讲的学生,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自己国家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情。大家的交流、讨论非常多,大学里很多的教授也参加这些讨论,很有意思,我想差不多像欧洲 1968 年一样的气氛,人们在街上听贝多芬的音乐,女孩子穿着很短的裙子在街上跳舞。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部分的外国人离开了成都,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女生留下来,那时没有课程,学校都停课了。我们的大使馆给我们寄来一封信,告诉我们离开的路线,但都是北京的地图,很可笑。我也想回国,但我怕回国以后德国政府可能不让我们再回来,可我很想继续留在中国,所以我不回去。但留下来也没有用,没有课,留学生宿舍里也没有人,我就去旅游,去了厦门鼓浪屿,看朋友们。

后来我还是回国,在柏林待了一个星期,在法国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坐飞

机又回到中国,又回到成都,继续学习戏曲方面的课。那时我还想学习川剧,对戏曲与政治的关系有兴趣,学了《潘金莲》,以及一些和社会生活有关的戏。1988年的时候,中国戏剧界创作了一些新的戏,很有意思的戏,我特别对女强人的戏有兴趣。那时很集中学习美学方面的知识,我一个人学习了美学家高尔泰的理论,一位男士给我讲中国的美学和历史,也讨论哲学方面的问题,如存在主义等。我感觉讨论和学习的方面越来越有意思。回国以后,我决定写我的毕业论文,特别是关于四川的地方戏曲。在成都时,我和一个川剧团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当时德国布莱希特的一个戏《四川好人》被四川省川剧院改编为川剧演出,这个戏讲的是三位神仙下凡寻找好人,到了四川,得到妓女沈黛的帮助的故事。我想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论文题目。刚刚准备写,一个德国人给我打电话,她说:“我刚结束了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四川好人》,听说你对这个很了解,我可以去和你交流一下吗?”我一听太吃惊了,什么?我在中国四川生活了两年半,但那个人没有去过中国,只是找了一些资料。我的导师也说,我仍然可以继续写这个题目,而且我用的资料肯定会很多、很新鲜。但是两三个月以后,我决定还是不能再写这个题目,我换了论文题目,后来转为研究80年代后期在中国刚刚开始的女性研究。

90年代初,在自由大学有一些学生运动,我们要搞自己的课,一个是翻译电视剧《河殇》,第二个是研究中国妇女的情况。我们有六七个女生一起组织。我去巴黎采访,我们也研究中国妇女在柏林的情况,我们自己教自己,没有一个老师。我们采访了一些中国妇女,问她们:在柏林的生活怎么样?文化冲突在哪儿?德国妇女与中国妇女的差别是什么?我们做了半年,购买、复印了很多书和资料,后来这个团体的人开始吵架,也有新的人加入进来,但是没写出来什么,这个很可惜。后来在1991年,罗梅君教授(Mechthild Leutner)召开了一个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也参加了,也有一个报告,以后收入了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妇女与社会》论文集里。我们那时要搞新的研究,一些想法和做法当然和教授有冲突,研讨会以后,我们就停止做那个课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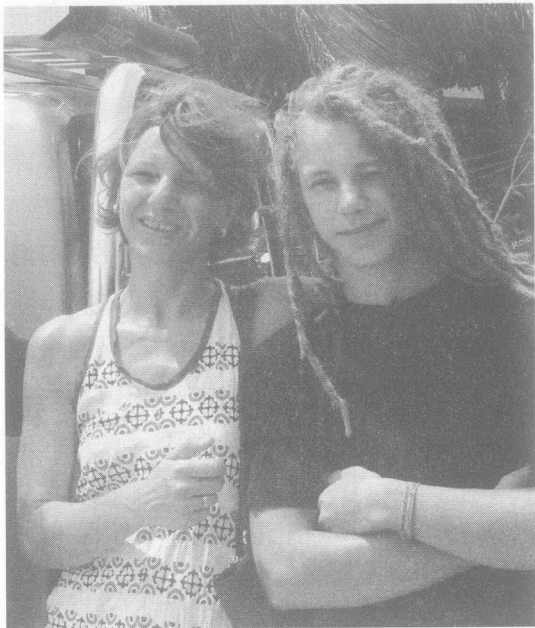
1992年以后我继续集中研究妇女问题,读了很多理论方面、哲学思想方面的书,还有后现代的一些书。以后决定写“马克思主义妇女学”,我特别对当时被看做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学发起人的李小江感兴趣,她是郑州大学教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的妇女研究组织,妇女NGO,也因此在中国开始有名。我想知道,为什么她叫自己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妇女学”和“毛泽东妇女思想”?

我开始读李小江的书,特别想了解她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的思想,因为我在成都一直在学美学。我认为,当你试着将女性视角融入哲学的观察,将会创造出一个非常新的哲学。我非常喜欢李小江的书,像《女人的出路》等,但最难的是把她用的一些外国人的名字翻译出来,很麻烦,在一般的词典里根本找不到,为了翻译和研究,我开始做自己的词典。为了了解李小江的理论和她成立的妇女研究所,我想要去采访她,当时没有钱,我开始当导游挣钱。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但还是坚持去做采访,后来我在郑州见到了李小江,对她的采访非常有意思。当时我们对独立研究的焦点有很多的讨论,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妇女的历史、妇女身份的问题,从历史的发展、中国与西方比较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问题。我回国以后,又读了很多她写的书,有一些是很抽象的、哲学方面的书。结果我发现,在德国大概一百年以前的第二国际和工人运动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提出的理论与要求,也不能随便拿到中国,应该要分析不同政治体制里面的因素,不同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对我来说,李小江的文章打开了一扇进入中国女性历史的窗户,因为她在评述西方历史的同时也在描述中国。我头脑中的一个看法变得更加清晰了,这就是如果你不能了解中国的研究,你也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特殊性。我感觉当时李小江认为,中国妇女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在妇女独立意识和自由组织方面的问题。

在写硕士论文的同时,1993年我生了我的第一个儿子,这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孩子刚出生时,我想,从现在开始,我要真正对生活负责,我要挣钱,找到稳定的位置。那时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要写我的硕士论文,开始有一些不自由的感觉,因为很累很累。孩子刚刚六天的时候,我们就搬到德国南方去,在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感到特别孤独。而我的专业课汉学、戏剧学、美学,每一次考试我都要跑到柏林去,在那里准备复习考试,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休息,很放松,所以我开始喜欢考试。我曾经责备自己不是好母亲,我不能一直照顾孩子,从早到晚觉得受不了,在南方不像在柏林,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带孩子。

1994年自由大学硕士毕业以后,我的导师罗梅君教授建议我继续写博士论文,我想这样也好,可以一边写论文一边照顾孩子,别的工作恐怕太复杂。罗梅君提到要和北大合作,组织一本“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女知青的回忆录,她希望我的论文可以考虑这样的题目。当时我刚写完关于李小江的研究,也在考虑:为什么在1966—1976年没有她的消息?那个时候她在干什么?后来突然想





苏诺娜(左)和她的大儿子

到,哦,她一定也是那一代知青,研究女知识青年应该很有意思,跟以前的题目也有一点关系。于是在1994年我再次到了北京,准备做女知青的访谈,为我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这一次,我的儿子尤纳斯也一起来北京,我们住在北京大学的北招待所,那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只有九个月,照顾他很困难,如果没有朋友帮助,访谈很难做。

那时我们和北大合作,准备出版一本女知青的回忆录,有五十个人参加了写作。<sup>①</sup>但是参加这本书写作的女知青,她们写的

文章只有三四页,对我来说资料很不够,我不知道一件事的前面与后面发生了什么,我还需要再了解。所以后来我又访问了很多人,我曾经和她们谈了五六个小时,我想知道她们全部的生活,从出生一直到现在。在谈话过程里,我感觉出来她们当时还是有害怕的心理和气氛,怕我要她们的电话号码,怕我录音。但是后来也有人帮我介绍另外的人,特别是那本书以外的人,她们有些人谈得很好,也很开心。除了采访,我也开始看一些关于生活历史、口述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书。通过对女知青的访谈,我希望从人物传记的方法上做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她们要写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选择别的?1994年,我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召开的一个女知青作者的出版座谈会,我也讲了我对于口述历史、知青历史研究的看法,大家反响很强烈。1996年,我一个人再次来北京,对于知青历史方面我想继续研究,补充访谈的资料,我感觉只做理论没有什么意思。我关于李小江的论文只是理论上的研究,这次女知青访谈的课题,则给我很多感性的认识,了解她们和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很近的关系,我非常喜欢做这个研究。

<sup>①</sup> 刘中陆、臧健、田小野:《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此书为与柏林自由大学合作项目。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诺娜与郑必俊老师的合影

我的博士论文有三个部分：第一是分析历史档案；第二是分析90年代关于“文革”的话语，可以说是公共回忆；第三是关于采访的分析——可以说是个人的回忆。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使我越来越感觉，了解“文化大革命”，对了解现代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些影响现在都存在。这个博士论文给我一个很好的点、一个基础来继续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写了五百页，和北大出版社的女知青的书可以说很不一样。我想知道“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女知青，她们怎么看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哪些方面我自己的女性研究与她们的见解不同？特别是在认识和经验方面。做了这个研究，给我很深的认识和理解，也留下了很热情的感觉。在我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可以说有三点非常重要的理论方法和途径：我研究和分析，个人的记忆如何被强大的公共叙述（宣传、电影、文学）所影响而且被改变？个人的记忆如何依赖并且建构着你现在的情形？什么是个人传记中的主要标准？一个变得非常清晰的想法是，“文化大革命”不是开始于1966年而是很早以前，至少在家庭历史的记忆中是如此；另外一点也变得很清楚，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清楚的结束，毛泽东的死亡对于个人的经历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在我的论文中，我总是试着依靠三种不同的案例来论证不同的记忆：一个人不能采用正式的、被公认的论述；一个人完全能适应公共的叙述；一个人试着建立一种非常不同的叙述。因此，一些女性仍然通过“集体的眼镜”来叙述她们的生活，一些人不得不收集在她们记忆中那些分散的碎片，因为她们不适合集体的

记忆。最后,个人回到城市之后设法建立的“事业”,是构成绝大多数人记忆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同样,处于完全不同情形下的外国人,无法了解中国历史中的这一个部分,我注意到这反而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做访谈的有利条件,因为我的访谈对象被迫详细地解释她们的意思,而且试图尽可能地准确。

我用五年的时间结束论文,2000年1月通过了博士考试。这期间,我要带孩子,没有工作,只靠奖学金。那时我一直想找到大学的工作,我最了解的课题当然是“文化大革命”,后来在柏林自由大学开始讲课,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没有多少人有兴趣。以后,我在杜伊斯堡大学政治系和东亚研究所得到了一个博士后研究生的位置。我们有一个研究课题,这是一个政治学领域的课题,也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课题,我们要了解,知识分子怎么分析和判断民主和政治改革?这当中的话语变化对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共有四个人,研究四个国家,我研究中国,另外有两个人分别研究日本、越南和马来西亚。我用了三年的时间,从南到北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中国的知识分子,讨论对于民主不同的概念,政治改革不同的看法,了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希望,以及如何从别的国家的民主模式来看自己国家发展的体制,主要是了解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的意见和看法。80年代的时候很简单,改革刚开始,有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个派别,比较容易。现在不一样,现在讨论得很丰富,也有很多种派别,现在政府、知识分子、老百姓相互交流,讨论怎么推动改革,知识分子会不会影响政治改革。我们的课题是“从1997年起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我自己是打开窗户看历史,从清代开始看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应该从陈独秀来看,来分析。我已经发表了一篇小的文章,讨论知识分子和五四运动。关于这个研究课题,我们组织了两个国际会议,还出版了两本书。主要比较四个国家政治改革的过程,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的一些政治改变。那个时候我在不莱梅、科隆的大学也教书,都是在政治系教现代中国政治的题目。

2004年以后,我开始在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German Federal Cultural Foundation)工作,那是德国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合作做一个很大的项目,题目是“北京现场”,是关于“高速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从拉丁美洲开始,然后决定在中国也要做这个项目。基金会让我做这个中国项目的主任。两年的项目,其中有一年是在柏林,我每个星期一要飞回科隆坐飞机到柏林去,星期五再坐飞机回来。一年以后,我搬到北京去,因为这个项目主要在北京。我们开始做准备,首先成立一个办公室,在朝阳区,和歌德学院合

作,开始找了五个人在我的办公室工作。因为这是一个奖学金的项目,一共只有十个研究位置,七个德国人和三个中国人,但是我们差不多收到八百人的申请。我完全想不到是这样的情况,在我办公室里装资料的箱子,一直堆得快到房顶,但是只有十个位置。确定了十个人以后,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孩子一起到北京来,我给他们找房子,他们四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和我们一起做这个项目。最后,一共有十五位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参加了这个项目。每个星期两次,我们都会有小的研讨会,和中国的科学家、艺术家共同讨论。2005年9月14—15日两天的时间,我们在大山子艺术区的798工厂内,举办了以都市化为主题的多学科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项目组的成员,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等高校的研究人员,还有记者、建筑师、艺术家等等。首先就不同题目有一个自由讨论,然后有三个分会论坛:社会与城市:社会分层和新身份;城市与空间:发展空间的限制;艺术与城市。大家围绕的主题是,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都市化时期,怎么样看待中国的都市化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之后,我们在798还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关于这个项目的成果出版了一本书《快速都市化》(*Totalstadt Beijing Case*),是德文版。

2006年结束了这个项目,我再次回到科隆,又开始在科隆和不莱梅教课。结婚以后,2007年我生了第二个儿子,那时我已经43岁。我一方面非常愉快,同时也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连一次也没有想过我的决定是错的。2007年到2008年,我也在多特蒙德大学(*University of Dortmund*)讲课,并且在空间计划学系做研究助理,在那边教中国城中村课。

从2008年1月开始,我担任“欧盟—中国民间社会论坛”亚洲基金会的常务理事。这个项目是由欧盟共同资助的,一共是十四个合作组织。这一项目的出发点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论坛的始创者感到,中国与世界尤其在经济和学术上的联系持续增长,这与公民社会建设方面合作的缺乏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我们看到了欧洲和中国公民社会合作发展的必要性。论坛创办的宗旨,是以改善社会、人权及生态状况,作为欧盟及中国建立发展关系时的基础;保证中国与来自欧洲国家建立的合资企业,能遵守相应的生产规定、社会及生态标准;增进欧中相互了解。我们实行的这个欧盟的项目,是关于欧盟和中国的民间自治交流([www.eu-china.net](http://www.eu-china.net))。在资金方面,我们得到了欧盟的资助,还有其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这个项目不应该是科学性的,但是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有很深刻的洞察力。我们主要集中于环境保护、社会安全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社会性别问题。一方面要拓展交流,特别针对一些对中国的了解存有偏见的评价,同时有为欧盟的议会提供顾问的任务。我们出版了很多关于中欧关系的资料,这些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在以下多个层面发挥作用:通过组织不同的研讨会和大会,使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各公民社会组织与中国的各组织建立联系。目前最重要的是双方进行初步接触并交换经验。第二步该是建立互相合作。除此之外,我们在公民社会和中欧关系领域有数量丰富的各种出版物(研究、背景分析、手册)以及教育资料可供使用。我们还通过展览,为中小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活动。网站([www.eu-china.net](http://www.eu-china.net))还公布新的出版物信息,通过博客“来自中国的声音”,使德国读者获悉在中国国内的各种讨论,发布公民社会和欧盟—中国关系领域的主题文章,为培训机构提供下载资料等等。2008年4月,在法兰克福举办了工作坊,题目是“欧洲非政府、中国和欧盟对中国的政策组织:微观下的公民社会观点、做法和角度”。2009年在广州和维也纳举办了两次研讨会,研讨民间社会的角色、民间社会团体的经验和思想交流等。然后出版了两本书,有英文也有中文版([http://www.eu-china.net/web/cms/upload/pdf/materialien/sausmikat\\_2010\\_global\\_concern\\_global\\_cooperation\\_chin.pdf](http://www.eu-china.net/web/cms/upload/pdf/materialien/sausmikat_2010_global_concern_global_cooperation_chin.pdf))。这些工作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还是有机会继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继续我对社会运动和历史发展的密切关注,以及对研究需求的展望(可以参看<http://www.de-cn.net/dis/phil/zh5794182.htm>)。

从80年代开始,我的生活和德国已经分不开,学习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和中国的联系很紧。开始的时候很清楚,我是以一个德国人的观点看中国,那时觉得我很懂,对什么东西似乎一看就懂了。但时间越长越不容易分清楚,很多看法会混淆。有时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我会问自己,我现在看问题的角度是不是受到中国人的影响?或者不是那么简单地去了解,也不是为了给别人了解,时间越长感觉越难。特别是现在,我希望我在德国待的时间能够长一些,但是在德国,很多人不懂我这样的想法和计划,因为很多人会说:“那里没有人权,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但对于中国的兴趣,使我有时经常会发生选择上的冲突,我不知道我究竟是要在德国生活,还是在中国生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想我们都有很特殊的机会,了解别的国家和文化,找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我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看他的母亲一直写论文,写博士论文,写教授论文,为什么?我觉得很累,而且往往不能继续现在研究的题目。在德国,很多写完教授论文的人也得不到教授的位置,他们跑到美国去,或是跑到英国去。女性和男性做汉学研究,我认为在科学上,在知识和学习的过程上没有什么差别。